

## 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林 绪 武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sup>①</sup>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不同的认识，也有些问题没有厘清。因此，结合过往研究，从“事件史”和“事件路径”的历史的双重视角，<sup>②</sup>从“三国三方”的大势，立体呈现黄华与司徒雷登交往的全景，考察商谈的缘起、内容和结局，探究其兴衰成败，体认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美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冲突及其复杂性、艰巨性，仍有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 一、“三国三方”的大势因缘

黄华与司徒雷登为什么会有南京商谈，这一问题需要超越中美双方而从“三国三方”的大势来考察。

#### （一）中共的决策与运筹

周恩来提出黄华与司徒雷登是“私人接触”。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指示黄华：“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sup>③</sup>显然，中共从一开始就将商谈定性为“私人接触”、“非正式”，秉持的是谨慎态度。在商谈过程中，针对司徒雷登的“北上北平”，中共既原则表示同意却又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sup>④</sup>也体现中共谨慎而为的立场。

\* 本文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号 TJZL13—007）。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②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9页。

④ 1949年6月12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致信司徒雷登：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代替中共高层向司徒雷登“抛下了橄榄枝”。（参见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

细察南京商谈的缘起，中共的决策首先是缘于美方的“信号”。第一，司徒雷登一直留在南京，“使各界对美国政府的意图产生诸多猜测”，<sup>①</sup>中共也不例外。而为了摸清美国的意图就要与之接触，黄华无疑是最佳人选。<sup>②</sup>第二，美国对华“正主张并执行撤退政策”。1949年1月26日，美国正式宣布结束参加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次日，“宣布撤销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暂停装运1.25亿美元特别用款的余额0.6亿美元的军需品”。<sup>③</sup>针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提案建议向中国提供15亿美元援助，3月15日，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回复称：按照中国现有情形，提案中所列出的援助，无论在规模或性质方面，都不合宜，一定会招致灾难性的恶果。<sup>④</sup>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会见司徒雷登请求美方贷款10亿美元，或者至少5亿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却遭到拒绝。<sup>⑤</sup>中共能够感受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正发生变化，对华政策正面临调整。第三，美方发出交往试探的信息。4月9日，毛泽东对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说：“美国政府通过其代理人（城市银行）表示愿意向中共提供总额为1亿到3亿美元的借款。”<sup>⑥</sup>17日，周恩来说：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sup>⑦</sup>中共察觉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寻求与中共交往的想法与行为，黄华同司徒雷登的接触正是中共作出的回应。第四，美方同中共开展贸易往来的要求。4月9日，中共收到香港十个美国商业组织发来的电报：“请求接待C.米尔斯代表，进行贸易谈判。”<sup>⑧</sup>后来，中共批准米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米尔斯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多家公司与中共谈生意，然而，“其政治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sup>⑨</sup>

毛泽东适时作出判断和决定。（1）“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sup>⑩</sup>（2）美国援助国民党反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 ①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 ② 中共确定这一人选是考虑到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早期“交情”。双方的交往可以追溯至黄华就读燕京大学时期，司徒雷登那时任燕京大学教务长，二人有师生之谊。1945年，美国派遣马歇尔使华以调停国共矛盾、避免内战爆发，敦促成立了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黄华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的秘书。1946年7月，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基于中共和美国方面的外事联系，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秘书的黄华和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就开始交往。所以，有学者提出，派黄华赴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乃中共为打开中美对话而精心安排的棋局”。（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 ③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3页。
-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077—1078页。
- ⑤ 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46页。
- ⑥ C.JI.齐赫文斯基：《关于周恩来的“秘密外交行动”和中共同美国人在1949年6月的非正式谈判》，马贵凡译，《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 ⑦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3页。
- ⑧ C.JI.齐赫文斯基：《关于周恩来的“秘密外交行动”和中共同美国人在1949年6月的非正式谈判》，《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C.米尔斯也译为索尔·密尔斯（Sual Mills），是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
- ⑨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共的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sup>①</sup>（3）“可以改变以前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采取的观点……在一些场合同它们建立实际的联系”。<sup>②</sup>于是，周恩来指派黄华赴南京和司徒雷登接触。

中共的决策也是基于某些主观考量。第一，获取美方情报的军事需要。毛泽东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sup>③</sup>黄华夫人回忆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了解美国是否有军事干涉的意图”，“对解放军挥麾向南方和大西南挺进有重要意义”，<sup>④</sup>体现出中共通过双方商谈获取美方军事情报的意图。第二，同国外保持商务往来以促进国内建设的经济需要。毛泽东提出新中国首先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sup>⑤</sup>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国家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三，获得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外交承认的政治需要。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我们”。<sup>⑥</sup>中共新政权建立后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是现实政治需要，毛泽东说：“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sup>⑦</sup>

因此，美方释放的“信号”促使中共对客观形势作出预判且很谨慎，是中共决策的条件和基础；而中共决策的根本因素，近期是要探明美方的某些立场，远期是要同美方建立贸易甚至外交关系。

##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

司徒雷登是否留在南京，美方的态度历经变化。1949年1月18日，司徒雷登把国民政府“通知外交团体南迁广州的消息呈报国务院”。27日，他宣布美方决定：“克拉克他们准备往广州，我却暂时留在此地”。<sup>⑧</sup>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我谨请求授权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讨论美国与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sup>⑨</sup>4月6日，艾奇逊谨慎同意并强调会晤及其内容绝对保密。13日，司徒雷登再收到国务院“批准逗留南京”的答复。23日，美方电告司徒雷登：“等候中共政权建立停当之后返回华府一趟”。<sup>⑩</sup>6月17日，美方再次要求司徒雷登回国。7月1日，艾奇逊要求司徒雷登“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sup>⑪</sup>7月28日，美方宁愿作出妥协也要求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对此，需要从美方对华政策的转型来考察。早在1948年9月，美方就提出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有随风转向、甚至抛锚停船的自由”，中国的前景不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5—286页。

② C.JI.齐赫文斯基：《关于周恩来的“秘密外交行动”和中共同美国人在1949年6月的非正式谈判》，《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93页。

④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⑦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8页。

⑧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53、61页。

⑨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4页。

⑩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09、119页。

⑪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8, p.769.

预测,“决不能死守任何一个行动方针,或仅仅对中国的一个派别承担义务而不知变通”。<sup>①</sup>“转向”、“变通”蕴含着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型。

1949年春,美国对国民党逐渐采取“脱身”、“观望”政策。2月5日,针对中国战事的变化,司徒雷登提议:“我们应采取一种沉默和观望的保留态度。”<sup>②</sup>3月,艾奇逊重提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sup>③</sup>既体现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将有所变化,也表明了美国对中共的外交政策。15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报告:“对一个已经是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22日,驻广州办事处报告被很多中国官员责骂,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所采取的‘观望’的政策”。<sup>④</sup>然而,美方并未彻底“脱身”。<sup>⑤</sup>这是因为美国内部对待国民政府的政策存在“反对援助”和“大规模援助”之分歧。前者来自驻华使团人员,他们身处中国能够体察到国民政府的失败,深知援助并不能挽救其崩溃。后者来自“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的“中国帮”,他们和蒋介石政权的利益联系密切,不能不出手相助。国务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美方基于客观形势不愿全力“扶蒋”,但国内政治势力的掣肘致使美方不能完全“脱身”,折中方案是削弱“扶蒋”力度。

美国对中共则采取“内部瓦解”策略。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的当前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共变成苏联的附庸”,<sup>⑥</sup>凸显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考虑。美国诸多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sup>⑦</sup>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制造中苏裂痕的舆论宣传。艾奇逊提出大量中国青年、大学毕业生加入中共,“并不是他们赞同共产党的思想”,“共产党军队里的思想并不是相同的”,“共产党军队里的派系很多”,<sup>⑧</sup>同样是基于意识形态因素为对中共实施“内部瓦解”提供认识基础。1949年5、6月,外媒传闻周恩来在西方国家开展秘密外交,“中共领导内部存在着两个有影响的、彼此敌对的派别,即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亲美派”。<sup>⑨</sup>6月3日,司徒雷登接到周恩来“有意要跟英、美当局接触”的“高度机密消息”,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sup>⑩</sup>展示美方部分官员对中共内部瓦解充满期待。同时,美方对中共实行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严格审查“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的出口”,但允许普通贸易往来,目的是恢复与中国正常的经济关系,借此制造苏联与中

①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第8、13页。

②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80页。

③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80—181页。

④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41、343页。

⑤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提请国会授权拨付5亿7千万美元的援华资金,4月2日,获批4亿6千3百万美元物资援助,这就是“1948年援华法案”。截至1949年4月3日,尚有5千4百万美元没有拨付,14日,国会通过拨付期延长至1949年12月31日的提案,规定1950年2月15日前,总统有权决定剩余款项的拨付,“继续对中华民国及台湾实行物资援助计划”,也就是援助“中国未被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体现美方并未彻底“脱身”。(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14、444页)

⑥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p.475.

⑦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⑧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23页。

⑨ C. JI. 齐赫文斯基:《关于周恩来的“秘密外交行动”和中共同美国人在1949年6月的非正式谈判》,《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⑩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37—138页。

共政权的分裂。因为美方认识到全面禁运需要西方国家全面合作而难度太大,也会激起中共反抗、倒向苏联,然而,适当的贸易接触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和中共的政策出现严重冲突,并有可能因此产生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sup>①</sup>

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变通思维为南京商谈提供了观念可能,对中共采取内部瓦解并在中共和苏联之间制造裂痕的具体实践为南京商谈提供了行为基础,所以,南京商谈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型期夹缝中的产物。

### (三) 苏联的态度及影响

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向我通报了两个问题:1. 作战进程;2. 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会谈情况……”<sup>②</sup>这是斯大林最早知悉南京商谈一事。26日,斯大林在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sup>③</sup>这有来有往的电报表明,中共主动向联共(布)通报南京商谈的情况,说明南京商谈进入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斯大林提及南京商谈仅此一次,其态度究竟如何?有学者根据1994年4月与齐赫文斯基谈话的笔记、齐赫文斯基的演讲报告提出: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双方接触的最新结果,斯大林认为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sup>④</sup>这表明斯大林关注双方商谈的进展,持一定的赞成态度,认为中共有必要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领域的接触。

据科瓦廖夫日记记载,1949年3月15日,斯大林建议和鼓励中共东北局领导人陈云,要“同国内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贸易活动,譬如说,同香港的或其他外国的资本家进行贸易”,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要疏远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看做是一支有助于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力量与之合作”。<sup>⑤</sup>4月19日,斯大林要求科瓦廖夫转告毛泽东:第一,“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第二,“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只要不附加限制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相关条件。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曾询问斯大林: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斯大林回答:“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sup>⑥</sup>7月27日,斯大林又告诉刘少奇:“你们有一条很好的行动路线——这就是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sup>⑦</sup>在获得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之前应当同他们进行贸易。

①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pp.832-833.

② C. J. 齐赫文斯基:《关于周恩来的“秘密外交行动”和中共同美国人在1949年6月的非正式谈判》,《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11期。

③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112页。

④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⑤ 尼·特·费德林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⑥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09—110、115页。

⑦ 尼·特·费德林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88页。

显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和赞成中共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往，尽管表示“反对与西方国家很快建立外交关系”。<sup>①</sup>应当说，中共和美国的各自考虑是促成双方接触的内因，苏联支持中共与美国的经济往来，就构成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的外因。

## 二、南京商谈的言、行、思

根据黄华、司徒雷登、傅泾波和 A.M.列多夫斯基等人的多种材料，<sup>②</sup>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言、行、思分析和总结商谈的主要内容。

### （一）所言

关于解放军士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的问题。5月13日，双方第一次商谈。黄华询问有关军队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的情况，司徒雷登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态度还好。黄华强调：“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sup>③</sup>司徒雷登驻华报告记载的黄华解释是：第一批进城的中共军队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尽最大努力查明侵犯者。”<sup>④</sup>其实，中共已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4月27日，毛泽东指出：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sup>⑤</sup>

关于司徒雷登前往上海和返回美国之事。6月6日，双方第二次商谈，“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黄华告知：“可按侨民身份来外事处申请。”<sup>⑥</sup>其实在5月31日，傅泾波已与黄华沟通了司徒雷登“访问上海的行程”。<sup>⑦</sup>6月8日，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黄催促我提供回国述职的细节，包括明确的日期在内。”<sup>⑧</sup>7月1日，美方作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中共与美国和解的一次尝试遭受挫折。<sup>⑨</sup>之后，司徒雷登着手为离华作准备，初定离华的日期是18日。而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离开南京就需要“铺保”或“人保”，11日，司徒雷登决定接受使馆人员“铺保”、自己“人保”的要求。16日，国务院训示他“拒绝任何保证”，<sup>⑩</sup>并由傅

①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② 傅泾波曾就读于燕京大学，1922年，接受司徒雷登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两人的交情从此延续一生。1946年7月，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以“驻华大使私人顾问”名义协助其工作，终身追随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称：“傅泾波之于我，就象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82页）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领苏联使馆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A.M.列多夫斯基奉命留守南京，“作为使馆一秘被任命为外交工作小组负责人”，黄华到达南京后常就相关外交问题与其交流。（参见A.M.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陈鹤编译，《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页。

④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89页。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2页。

⑦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36页。

⑧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3页。

⑨ 陶文钊：《1949—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与承认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⑩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52、154、157页。

泾波立即将此消息通知黄华,强调“此举有损美国政府尊严”。<sup>①</sup>17日,黄华就这一问题请示中央,“如允司徒雷登等人免除铺保,即须豁免全体外国外交人员……建议对各国原大使、公使出境,可免除觅保手续……其他一般外交人员仍照规定办理。”19日,周恩来批示:“同意你们对各国大使、公使出境免除觅保手续,但其他外交人员仍须履行觅保手续的规定。”<sup>②</sup>25日,黄华和司徒雷登就离华问题举行第四次商谈,因“对前途展望的不同观点”,双方实际上“陷于紧张状态”。同日,司徒雷登收到国务院回复,知悉“白皮书”将延缓至8月2日公布,他打算在此之前离开中国。27日,司徒雷登因无法通行而发出“一份急件”再次请示国务院。28日,他收到国务院的来信,“核准以大使馆作为‘铺保’”,<sup>③</sup>并立即将此消息通知黄华。同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指出美国国务院此前要求司徒雷登拒签保单“系威胁性质”,指示黄华立即召见傅泾波,“告以军管会允许司徒以外人员觅私人担保”,如傅泾波“当场愿给其他外人签具保单,而他自己又找到中国私人保单,亦可当场应允”。<sup>④</sup>30日,黄华和傅泾波最后一次接触,进行了“非常透辟的讨论”。<sup>⑤</sup>8月2日,司徒雷登等离华。

关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黄华说:“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sup>⑥</sup>列多夫斯基转述:“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是想与新中国政权建立联系。”<sup>⑦</sup>然而,司徒雷登日记及驻华报告只提及:“希望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有助于恢复这些关系”。<sup>⑧</sup>“以往的友好关系”意味深长,“以往”指美方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是时间界定;“友好关系”指以美方为主导的同国民政府不平等的盟友关系,是性质界定。这虽是司徒雷登外交辞令,实包含“留在南京的目的是想与新中国政权建立联系”之意,不过“联系”暗含以美方为主导的不平等因素,这也符合美国一贯的霸权主义思想。

关于司徒雷登“北上北平”的问题。黄华回忆,6月8日,傅泾波说美国副国务卿魏伯致电司徒雷登,望其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以了解中共的意见,请黄华代为转达中共。接到黄华请示后,中共中央提出通过非官方渠道同司徒雷登接触,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26日,司徒雷登收到陆志韦来信。27日,傅泾波携此信前往见黄华,信中说:“司徒雷登如要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傅转述司徒雷登希望黄华去电问明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华经报告中央并获得周恩来指示,28日,双方第三次商谈,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sup>⑨</sup>29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请示是否同意其北平之行。<sup>⑩</sup>30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提出北平之行的价值,能够同中共最高领导人非正式

①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关于中美关系的电报、批示选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

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关于中美关系的电报、批示选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周恩来在批示中指出：“本来外交人员请求出境，可以不必觅保检查，因为你们已经宣布在先，故目前只能免除大使、公使而不免除全部外交人员……以后对于这类事情，必须仔细考虑，不要冒昧决定。决定做的事，非情况有变，决不更改；而且凡非例行公事，必须事先请示勿违。”可见，黄华等事先未请示中央而作出司徒雷登出境需要提供“觅保”的决定。

③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62—163、164页。

④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关于中美关系的电报、批示选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

⑤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65页。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页。

⑦ A. M. 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⑧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8页。

⑨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3、84页。

⑩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49页。

会谈，“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带给华盛顿关于中共意图的“最权威的报告”，“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体现对北平之行充满期待。由此可见，司徒雷登“北上北平”虽然是傅泾波“并非根据”司徒雷登的要求而“随便问”的，<sup>①</sup>但司徒雷登对此给予认可并报告国务院。6月24日，1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致信杜鲁门总统，呼吁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承认中共政权，杜鲁门回信答应了这一要求。7月1日，美方致电司徒雷登不得前往北平。即便如此，14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其他朋友告知的消息，说：“我在北平会受到欢迎”、“毛和周期待款待我，并和我会谈”等。<sup>②</sup>20日，司徒雷登“考虑再给国务院发出一封具劝告性的信，提议往北平一行并亲自往见毛泽东他们”。<sup>③</sup>司徒雷登对北上北平的心情可见一斑，但“美国政府从无此意，是司徒雷登先斩后奏被否决的”。<sup>④</sup>

关于在华的美国侨民及使馆人员地位。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不予承认”政策。<sup>⑤</sup>4月28日，毛泽东提出对一切侨民及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sup>⑥</sup>5月13日，黄华向司徒雷登谈及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sup>⑦</sup>并宣告中共新政权实行保护外侨的政策，和司徒雷登的报告中黄华所说“已向所有部队下达命令，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相吻合。司徒雷登则向黄华“解释了外国领事馆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保持非正式关系的作用”。<sup>⑧</sup>事实上，5月7日，黄华与傅泾波面谈就指出不承认司徒雷登为大使，也不承认留在南京的别国大使，因为他们是派驻国民政府的使节。6月6日，黄华重申对待外国使馆及人员的态度和理由。7月25日，司徒雷登又提出上海美侨问题，黄华说：一切外国侨民同等对待，“凡愿意留在中国并遵守法律的，我们都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sup>⑨</sup>

关于美国同国民政府的关系。5月13日，黄华提出“中国人民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不满”，<sup>⑩</sup>司徒雷登回答：“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6月6日，黄华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党逃亡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回应美援“已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sup>⑪</sup>对于美国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这一点，首次商谈时“司徒雷登以沉默回避”。<sup>⑫</sup>黄华回忆录记载第二次商谈时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

- ①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7、306页。
- ②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11页。
- ③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59页。
- ④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再版序言”，第Ⅶ页。
- ⑤ 具体内容：“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
- ⑦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页。
- ⑧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9页。
- ⑨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4页。
- ⑩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8页。
- ⑪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82、83页。
- ⑫ A.M.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sup>①</sup>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记载：“仍留在南京的各使团团长（苏联除外），可以被中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双方的表述虽不相同但主旨基本一致。司徒雷登也阐明与国民政府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缘由：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名义上处于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直到目前共产党还没有“全国范围的行政机构，好让其他国家与之联系”。<sup>②</sup> 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此外，黄华与傅泾波交谈时也提出美国如愿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sup>③</sup> 这就说明美方既不紧随国民政府南迁又不断绝与其关系的立场，看似矛盾，实际上体现美国对国民政府及中国政局发展的“观望”，以赢得其外交利益的最大化。

关于撤退美国在华驻军。5月13日，黄华提出美方应该将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艇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也作了解释：“除一小部分驻留上海的海军——其惟一目的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国民党方面的破坏。”<sup>④</sup> 同日，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报告显示，美方认为“这是由于在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人的生命需要保护”。<sup>⑤</sup> 黄华与傅泾波交谈时也提出美国如想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sup>⑥</sup> 25日，美军撤离青岛。

关于新中国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5月13日，黄华阐明了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遵守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立即撤出本国在中国的驻军；立即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停止提供任何帮助。<sup>⑦</sup> 司徒雷登提出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可以得到承认”。<sup>⑧</sup> 这正是艾奇逊向他提出的承认中共新政府的依据：“a. 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b. 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c. 其掌权得到国内人民普遍接受。”<sup>⑨</sup>

关于新中国政府人员的构成。黄华回忆，5月13日，司徒雷登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回答：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sup>⑩</sup> 司徒雷登的报告则担心“中共会建立一个独裁政府”，期望更多民主人士参加政府以削弱“独裁”势力，他认为如果“新政权采取更独立的民族主义，抵制亲苏路线”，大批自由主义者就可能与新政权合作。<sup>⑪</sup>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2页。

②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1页。

③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2—83、82页。

④ A.M.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⑤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9页。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2页。

⑦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外交立场是中共已确定的方针，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再次公开提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6页）

⑧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9页。

⑨ 转引自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426页。

⑩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1页。

⑪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85、303页。

## （二）所行

黄华与司徒雷登交往，遵照周恩来“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sup>①</sup>“进行私人接触”的要求。收到司徒雷登参加生日宴会的邀请，黄华立即请示，中央告知以私人身份致函司徒雷登说明因事不能赴宴，黄华即“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这个邀请”。<sup>②</sup>黄华与傅泾波见面商谈多次，但是，黄华也将双方交往限定为“私人接触”，是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南京商谈。

司徒雷登则四下活动向中共高层传递信号或获取情报。一方面，借助陈铭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作为中间人来联系中共高层。6月10日，司徒雷登与陈铭枢等会谈近四个小时，因考虑“跟中共领袖们接触的机会很微”，把“四篇有关中共的专论”面交给他们，请其转交中共高层。<sup>③</sup>司徒雷登又委托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六十亿美元的支援，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但是，罗隆基并未向中共领导人转告，原因是陈铭枢向周恩来转达后“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sup>④</sup>也因为“得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即将发表（其中有‘一边倒’的方针），未敢向毛泽东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许多年以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sup>⑤</sup>另一方面，搜集中国政局的情报。从南京解放至飞离南京，司徒雷登与不少中国重要人士见面交谈，或保持书信电报往来，如黄绍竑、吴贻芳、张东荪、陈铭枢、罗隆基、章汉夫等，借此直接、间接获取中国政局的信息并发给美国国务院，与张东荪的交往就足以证明。5月20日，司徒雷登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把消息转达张东荪”，27日，司徒雷登收到张东荪回信，28日，司徒雷登回复张东荪，“请他在七月二十日前”来南京，并且“再三地把他信里提到的消息要旨报告国务院”。<sup>⑥</sup>他们来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可考但定与时局相关，若仅仅是私人的交情或应酬，司徒雷登怎会向国务院报告？6月11日至16日，司徒雷登的上海之行，“更有实际意义的也许是某些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土极为秘密的来访”，罗隆基即是其一，并与章汉夫长时间谈话，“章在这里的身分相当于黄华”。<sup>⑦</sup>

## （三）所思

南京商谈过程中，黄华坚定执行上级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遇到是否修理美国使馆飞机、是否同意司徒雷登访问上海及北上北平等问题的，黄华都会先请示，得到指示后再给予答复。黄华的思想立足点就是毫不含糊地阐明中共外交立场，敦促美国从中国撤军、同国民党断交、做有利于中美双方的事情，展现了政治上的一贯性和坚定性。

然而，司徒雷登的主观色彩很明显。检视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发现他对中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持恐惧和敌视心态，多次使用“暴政”、“专制”、“独裁”、“敌视”、“恐怖”等修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79页。

② A.M.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③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41—142页。“四篇有关中共的专论”，实际上是四个文件，主要内容“在于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是何等有利与重要”。另外还有美方的五点意见，大致是对目前及将来的中美关系表示关切，强调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参见牛大勇：《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团结报》1989年7月11日，第2版）

④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6—67页。

⑤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85页。

⑥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第131、134页。

⑦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5页。

饰语。他眼中的共产党与“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权利”等无异于南辕北辙，多次表达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对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理论普遍抱有恐惧”，<sup>①</sup>体现其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共的立场。所以，他提出：“在与共产党国家政权建立关系上，我强烈地反对首先采取行动。”<sup>②</sup>

司徒雷登是想以美国式民主自由观念来影响中共，他认为中共的“反美情绪”和“对美国的敌视”，既有受到克里姆林宫路线影响的“宣传目的”，也有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国人独特个性的“猜疑心理”，还有“天真的误解”因素。所以，他主张以“非官方的身份”同中共高层接触，传递一些看法，“以期达成彼此了解”，“消除彼此的怀疑和误解，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使得美国的民主影响能渗透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减轻其独裁势力”。<sup>③</sup>这就体现司徒雷登提出的“消除误解”、“彼此了解”，是以美国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了解，是要中共消除对美国民主自由的误解以实现了解，却不是自我消除对中共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误解以达到了解，恰恰体现司徒雷登“天真的误解”。

### 三、利益博弈的无果而终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黯然离去，南京商谈戛然而止，这虽是美国单方面作出的决定，但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

#### （一）中共的多种考虑

南京商谈过程中，中共的谨慎态度源于种种现实考虑。在七届二中全会和新政协筹备会上，中共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同时，列多夫斯基证实：“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政策有怀疑。”<sup>④</sup>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联共（布）的不信任。<sup>⑤</sup>为此，中共需要采取行动来消除其疑虑，一方面，酝酿并逐步推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9年2月初，米高扬秘密访华，<sup>⑥</sup>两党就中苏条约、对新中国援助、新中国外交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初步共识。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外公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中共明确表示要重新审查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有利的，新政权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不利的，都准备加以废除。另一方面，中共将南京商谈的情况主动向苏方通报，5月10日、15日，黄华向列多夫斯基讲述了7日同傅

①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98、302页。

②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第70页。

③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84—286页。

④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给中共领导提出的十二条建议》，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⑤ 毛泽东直言：斯大林对中共能否打败国民党“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1页）周恩来讲过，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2页）

⑥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时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婉拒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但是指出“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米高扬就是最终人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39页）

泾波、13日同司徒雷登商谈的情况，列多夫斯基答应把“我们谈话中涉及到的民主政权的内容向莫斯科方面汇报”。<sup>①</sup>中共通过科瓦廖夫和列多夫斯基把南京商谈的实情和进展传递给莫斯科，黄华与司徒雷登的商谈保持谨慎和非主动，都是消除联共（布）及其领导人疑虑的重要表现。

此外，中共并未放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性。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sup>②</sup>6月30日，周恩来指示黄华：司徒雷登北上北平及与中共高层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sup>③</sup>无疑，中共担心美方利用此事做文章，提前作出相应防备，体现对美国的警惕性。7月4日，刘少奇表示：“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并且是有过经验的，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sup>④</sup>黄华赴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中共又对美方抱有防备心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中共已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sup>⑤</sup>

总之，中共的对外政策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向苏联靠拢，另一方面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对待西方国家作了两手准备，既不抱幻想也不放弃接触的机会。这样，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中共选择倒向苏联；虽然不放过与美国接触的机会，但始终未放弃对其戒备和警惕。因此，南京商谈难逃终止的命运就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围绕意识形态划分敌我，揭开了冷战序幕，一个国家要么属于美国领导的集团，要么站在苏联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sup>⑥</sup>即是说，中共对外政策的种种现实考虑也难免受到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和制约。

## （二）美国的遏制政策

国际冷战格局业已形成，中国战局胜负即将揭晓，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变为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推行遏制政策，外部打压和内部瓦解双管齐下。

外部打压，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联合阵线，一致以“承认新政权与否”向中共施压。留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与西方各国大使团召开相关会议约4次，出席宴会约6次，私人会见约13次，所谈内容多涉及对华政策。1949年5月6日，艾奇逊致电驻英、法、意等大使馆：“希望相关的西方国家要对这一问题（指承认问题——译注）采取共同立场。”<sup>⑦</sup>认为“美国不应该针对承认问题采取任何行动”。<sup>⑧</sup>13日，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应当强烈地反对任何国家仓促地承认共产党作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权”，应当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认同，“以便有望在这个问题结成联合阵线。”可见，美国企图建立联合阵线共同“不承认”中共新政权，从而以“承

① A. M. 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0页。

⑥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462页。

⑦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 17.

⑧ William Whitney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Raleigh: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 121.

认为“正式承认的议题是同中国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筹码。”艾奇逊认为：“不应把美国的正式承认作为政治武器加以利用，除非是在由此能为美国带来国家利益的极端情况下。”<sup>①</sup>因此，“承认”与否隐藏着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英国外交官说要仔细研究中共新政权的性质，“特别要考虑它控制区域的范围以及对英国的利益和贸易的态度”。<sup>②</sup>艾奇逊提出：“承认是否有望最大限度保护美国利益？”法国外交部提出，“一旦中国共产党政权采取主动以争取获得承认并同意承担前政府的条约义务，西方国家就不应当延迟承认。”<sup>③</sup>所以，美国一方面向盟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按照美国步调行动，另一方面同中共接触，提出承认新中国的条件，试探和摸底中共的立场，实质上是讹诈和要挟中共遵守所谓的“国际义务”，从而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sup>④</sup>体现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立场。

“内部瓦解”和“外部打压”的手段不同，可目的相同，只是不同手段使南京商谈产生了不同结果。内部瓦解手段为南京商谈提供了某种契机，外部打压手段则注定南京商谈的无果而终，美方否决了司徒雷登北上北平的计划。首先，北上北平会让美国政府遭受国内舆论主要是援蒋集团的批评。援蒋集团要求美国提供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阻挠承认中共新政权，“制造一种气氛，形成一种经常的压力”，使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事先就得“把这一压力考虑在内”。<sup>⑤</sup>其次，北上北平会导致大西洋外交使团的误解。美国早前游说西方各国坚持“不承认”政策，“一致对付共产党”，而现在美国驻华大使又率先北上北平将失信于西方各国。再次，北上北平会提高中共的国内外威望。美国驻华大使前往北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对中共的某种妥协，是美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即是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然而，美方认为中共的经济建设会有求于己。1949年6月中旬，司徒雷登提出中共地方当局急于发展国际贸易，“他们特别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sup>⑥</sup>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认为新中国出于获得经济援助的目的，“最终必将转向西方而不是苏联”，强调承认和贸易问题都需要“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主动，这是惟一应遵循的路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指出：“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美国拥有对付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武器。”<sup>⑦</sup>杜鲁门认为中共在经济上迟早会向美国求援，言外之意，妥协或采取主动的应当是中共而非美方。然而，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了司徒雷登的认识，7月6日，他说：“政治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重于经济考虑的程度”，“毛并不担心美国的经济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再也没有如此清楚地表明……‘毛现在不会被收买’……”<sup>⑧</sup>因此，美方的“不承认”和遏制政策，是现实利益考虑使然，因而对中共实施经

①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p. 23, 6, 22.

②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 6.

③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p. 22, 26-27. “Does This Recognition Offer Best Hope for Protecting American Interests?”有学者译为“承认是否能为保护美国利益带来最大希望？”（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427页）有学者译为“承认是否有望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利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第75页）

④ 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年）》，《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⑤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314页。

⑥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7、305页。

⑦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第80、106—107页。

⑧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10页。

济诱惑，也是意识形态差异所致，因而向中共施压，并且是为了制衡苏联。有学者提出，这说明现实主义的艾奇逊和道德主义的艾奇逊陷入利益和道德的两难。<sup>①</sup>

### （三）苏联的矛盾心态

事实证明，中共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并且谨慎防备西方干涉，与斯大林的建议基本一致，可以说，苏联对南京商谈的结局产生了实际影响。

1949年7月11日，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建议中国“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sup>②</sup> 参加会谈的科瓦廖夫认为，“斯大林对待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所持的”态度，“并不是最肯定的”，直率地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sup>③</sup> 同时，斯大林提醒中共要防止敌人利用政局真空进行干涉，认为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但是，斯大林主张中共谨慎地“拉拢”美国，米高扬据此向中共领导人声明：“对美国财产则需取谨慎政策，以使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会受到‘共产党’新政权的照顾。”<sup>④</sup> 苏联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给美国进行干涉的借口。

无疑，苏联建议中共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要时刻防备西方国家的干涉；赞成中共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但更深入的交往又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斯大林出于策略考虑赞同双方接触，但是担心过多接触会超出苏联的控制，进而导致中共与美方的接近。这样，苏联方面明显存在的矛盾心态，影响了南京商谈的结局。

总体来看，南京商谈的前前后后，始终贯穿着中美苏三国三方利益的博弈。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中共派黄华赴南京与其接触，这是中共与美方互为试探和摸底的交往，各自利益需求是促成双方接触的主要因素。罗申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是从苏联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以防局势逆转而陷入被动，毕竟美国并未完全“脱身”。中美苏三国三方的决策都是以其他两方的政策或态度为依据。一方面，美苏两国都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都争取国共双方的认可，对国共双方采取“脚踩两只船”的政策和态度，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或罗申南迁广州就是实际表现。另一方面，为谋取新中国的法统地位、发展经济和对外平等交往，中共不放弃与美苏任何一方交往的可能。派黄华赴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体现中共试图打开对美政策调整的窗口，甚至中共领导向美方表示了对建交的兴趣。<sup>⑤</sup> 但是，商谈并没有为中共调整对美政策找到利益交汇点，双方分歧很大，因利益的不可调和而终，体现中共同美方接触坚持了“原则不能再改，方法不妨灵活”的战略。<sup>⑥</sup> 同样，司徒雷登上海之行后也有自己的成算，即“坚定而又策略地坚持原则”来影响中共的政策。<sup>⑦</sup> 可见，中共和美国都有各自坚持的原则和利益，黄华和司徒雷登南京

①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5页。

③ 尼·特·费德林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88页。

④ 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⑤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93页。

⑥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关于中美关系的电报、批示选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这是周恩来于7月28日对南京市委和华东局办理司徒雷登等外交人员离境手续作出的指示，笔者以为这也就是南京商谈中共的原则立场。

⑦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5—306页。

商谈则是双方灵活的方法和策略的体现。

## 结 语

中共虽然将南京商谈定性为“私人接触”，但黄华是得到中共的认可和授权的，每次商谈前后都要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司徒雷登同样获得美国国务院授权以“非官方的身份”同中共高层接触，并一再报告商谈情况。因而，南京商谈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美国交往的缩影。

南京商谈的缘起，根源于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可能性。中国战局胜负即将揭晓，美国不能不在“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与新政权的胜利这一确定了的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他们今后的政策”。<sup>①</sup>就美方而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既要考虑与中共高层开展交往，又要考虑在中共和苏联之间制造裂痕，所以，同意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体现美国“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sup>②</sup>就中共而言，基于美方的“信号”，为摸清美国真实意图、谋划建立双边贸易关系甚至外交关系的可能性，所以，决定派黄华赴南京。加之苏联支持中共与美国的经济交往，内外因共同促成了南京商谈。

南京商谈的终止，受制于中共与美国有限度的交往。美方是想以“不承认”为武器延续“条约制度”，<sup>③</sup>迫使中共接受美国和国民政府签署的旧条约以维护在华特权，体现了美国对中共所持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共则不承认这些旧的条约，力图打破对外交往的不平等机制，开创全新外交关系，展示出中共推行和坚持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外交政策。这样，在最为根本的主权问题上，中共与美国各执己见，双方利益交锋的不可调和导致南京商谈无果而终。

黄华与司徒雷登虽然是私人接触，没有取得实质结果，但这也是中共与美国交往的一次尝试，是中共与美方的第一次商谈，折射了中共与美国的外交策略和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时，商谈的方式也开启了中共新政权解决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正确之道。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正常外交关系的建立依然是通过商谈的方式来解决。当下，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说，商谈和接触仍是解决或缩小中美之间矛盾或分歧的唯一途径。

附识：多位匿名外审专家仔细地审读了本文，提出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扶志刚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林绪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耿显家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山极晃：《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鹿锡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③ “条约口岸体制”（或谓“条约制度”、“通商口岸体制”），是指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西交往体制。（参见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